

新时代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探析

姚金伟

（国际关系学院 经济金融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如何深刻理解资本功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笔者提出了资本功能复杂性即资本兼具有效性、局限性和破坏性的理论观点。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企业家或资本家作用的发挥是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现实投射。从资本功能复杂性的视角出发，本文详细考察了新时代资本治理的全景框架：在新时代对资本功能再认识部分，强调了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和政策保障；在新时代资本治理的新议题部分，从技术变革、资本控制和政策监管的视角剖析平台经济监管，这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资本部分，突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指导原则，分析了资本在发展与安全中的作用，领悟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驾驭资本的成功经验。提升国家资本治理效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笔者提出要充分激励资本有效性，矫正资本局限性，防治资本破坏性，完善同资本功能复杂性相适应的新型资本治理体系，强化全过程资本监管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资本功能复杂性；新时代资本功能；平台经济监管；统筹发展与安全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3)07-0031-11

一、引言：资本之谜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理论和各国发展实践普遍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索托^[1]指出，“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只有25个国家能够创造出数量充足的资本，从扩大化的全球市场中，充分享受劳动分工带来的好处……只有资本，才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是资本的匮乏阻滞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完善产权制度，建立规范的经济运行信任体系，充分激发资本活力特别是财富创造能力成为各国发展的共识。

资本很关键，但并不意味着全部。资本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究竟产生了什么实际后果，这引发了激烈争论。资本必然带来经济繁荣并不是“完整的事实”，有些国家成功了，但更多的国家失败了。现实社会中经济不平等比比皆是，即便是在最发达的“七国集团”，贫富差距仍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在不断催生极右主义，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自由市场所引以为傲的全球化非但没有缩小国家发展差距，反而加剧了贸易冲突和地区动荡，进一步强化了世界体系中“中心—边缘”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以至于全球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带头破坏全球化，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规则，试图瓦解并取代各类小型贸易集团。不只是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中国经济安全波动研究：任期周期的视角”（2020GA02）

作者简介：姚金伟（1990-），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E-mail: yaojinwei01@163.com

社会经济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疾病控制与人类健康和国际教育合作等也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资本不断将自然资源、药品和教育等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商品化、金融化，借此实现排他性占有并牟取暴利。环保主义者不断批评国际资本过度逐利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修补的损害，全球变暖及生态恶化没有得到有效应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背后可能只是大型跨国医药公司的“生意”，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门槛进一步提高和移民管制更加严厉等。有关资本负面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何准确全面地理解资本功能，这的确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谜。资本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要素，它的影响力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2]指出，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货币，能够不断进行价值增值。资本虽然表现为货币和商品，但资本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可以离开它们而独立存在，它们只是创造和维护资本的手段，并需要转化为资本。随着资本积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慢慢地就从经济要素转变为社会权力。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指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就是“财富的权力效应”，经济影响与政治控制的效果是一样的、多数情况下甚至更有效。资本的作用如此巨大，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功能复杂性日益凸显。相应地，理论研究和政策监管就变得十分必要而紧迫。对资本功能复杂性认识越清楚，越有助于揭示资本之谜，从而越有助于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二、理论综述：资本功能的三种代表性解释

一部经济史主要是资本发展史。资本是人类社会经济逻辑主线，对资本了解得越多，对现代经济的认识就越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是现代性概念，建立在“普遍性交往”的基础之上，具有世界性特征和全球扩张的态势。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凭借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优势，率先探索现代化模式，并一度将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似乎这是唯一模式。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兴起改变了这种单一模式。针对资本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差异性作用，张亚泽和张固宁^[3]区别了两种现代化道路，分别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人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进一步思考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纵观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对资本功能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下述三种代表性解释，即资本有效性、资本局限性和资本破坏性，这整体上反映出资本功能复杂性。因此，理解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建立在对其复杂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此，周建波和陈洲扬^[4]在对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比较分析中得到了资本多面性的结论，甚至胡博成和朱忆天^[5]直接提出“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首先，资本有效性的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斯密^[6]直接将资本视为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主张节约资本、积累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古典经济学家坚信资本积累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根源，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使得产出效率和资本回报率进一步提高，而储蓄率的提高对资本积累形成了正向反馈，诸如萨伊^[7]、李嘉图^[8]与穆勒^[9]等均持此种观点。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揭示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其规模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索洛模型做了进一步的修正，揭示了资本投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紧接着，罗斯托^[10]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论，强调起飞阶段是一国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而在起飞阶段的首要条件是提高生产性投资率，由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净值的5%增加到10%以上，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强调资本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资本充裕既是国家发展的原因也是发达国家的直接经济表现，相应地，资本匮乏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特

征。发达国家的富裕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受此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进教育和健康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民主制度变革等以吸引国际资本，进而改善本国要素禀赋。洪银兴^[11]指出，《资本论》中对资本五个方面的定义充分肯定了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于它本身的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要素的黏合剂，在不同要素之间的配置所起的提高生产力作用。”因此，资本是“第一推动力”，甚至是“普照的光”。

其次，资本局限性的解释。资本不是铁板一块，既有“资本一般”，更有“资本特殊”，而且始终处于逐利竞争当中。因此，我们不能只从积极性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要对资本竞争进行科学分析。顾海良^[12]基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的详细考察，指出在资本竞争和资本积累的驱使下，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必然的过程，而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也必然造成资本无序扩张和极度膨胀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绝对规律支配下，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就成为“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在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贫富差距、社会失业、阶层分化、伦理冲突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等问题不可避免，这是资本所代表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赵峰和田佳禾^[13]基于资本二重性剖析了资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和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薛加奇和钱智勇^[14]从资本发展悖论的视角，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个维度展开剖析，揭示了资本发展的社会局限性，实际上是靠“牺牲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

最后，资本破坏性的解释。第一，对人的破坏，把人变成了工具。张一兵^[15]基于对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详细考察，从物相化的角度指出，正是在资本所主导的生产关系之下，劳动者才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拿工资”的雇佣劳动者，本来是生存目的的生命活动，甚至是实现生命爱多斯的劳动，颠倒成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悲的谋生手段，而且工人只有在资本力量不断增强时才能勉强活下去，因为一旦资本家工厂倒闭，工人就会没有饭吃。从这个角度看，工人不属于某个资本家，而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第二，对公权力的破坏，把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变为“奇货可居”。资本影响乃至腐蚀政治程序是资本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资本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资本利益，导致腐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说到底还是资本家的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即便是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资本在生产方式中发挥主导作用，政企利益集团的形成、游说和贿选行为，以及谋求政治权力甚至对政府权力机关进行渗透等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郭威和李泽浩^[16]指出，企业集团会主动寻求政治联系，与政府官员结成政企利益集团，扶持代理人和牟取特许经营等，以解决自身利益诉求。在资本的侵蚀下，公权力也成为了资本逐利、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和工具。第三，对实体经济的破坏，经济“脱实向虚”，金融化、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等突出。乔晓楠^[17]从《资本论》关于生息资本的论述出发，利用一个异质性主体模型来阐述利息率、杠杆率和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在资本技术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运动会作出差异化的职能选择，利息率、杠杆率和资产价格将被同时内生决定，在技术周期的不同阶段生产投资与金融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会出现反向变动，并导致经济“脱实向虚”，相应地会造成流动性扩张，有加剧金融危机的风险。第四，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破坏，催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持续恶化、愈演愈烈。马拥军^[18]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的转变，指出如果只是“相对过剩”，通过提高工人收入就可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但“绝对过剩”就迫使资本“制造短缺”，这就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被夸大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生产过剩包括了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资本价值观无法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资本扩大再生产迫切需要新的制度

转型框架。第五,对环境的破坏,掠夺和污染获得了合法性。许欣驰和薛忠义^[19]认为,资本是破坏环境的力量,作为主体化的资本在增殖的过程中不会顾及环境的承载力、净化力、再生力,把环境资源要素商品化,以赚取更多的货币,这就造成了资源环境的“贫困积累”。

这就凸显了新时代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要认识到资本功能兼具有效性、局限性和破坏性三个维度,这是对资本作用的全面认识。第二,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资本功能具体维度的展现同实际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资本治理政策取向及效能等密切关联,资本功能呈现出哪一个维度具有不确定性。第三,从实践逻辑的角度看,资本的一般性规律,尤其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受到政治倾向和政策取向的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是明例,其中涉及所有制、分配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等内容的辩证统一,特别是涉及“既快又好”等多样性目标的追求。

与资本功能复杂性直接相关的是资本的人格化问题,即企业家或资本家作用的发挥。熊彼特^[20]对企业家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创新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活力所在。凡勃伦^[21]则通过对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的反思,指出资本家为了积累财富而善于掠夺,对资本家而言,财富是名声和社会地位的基础,“掠夺的本能和随之而来的对掠夺效率的赞许,深深地印刻在历经掠夺文化规则长久熏陶的人们的思维习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22]更进一步地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们认为,资本的概念包含着资本家,资本家是由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这三种代表性观点集中展示了资本有效性、资本局限性和资本破坏性功能。对资本功能复杂性的认识也决定了如何看待企业家或者说资本家的作用,同样是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行为期待,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更进一步地,资本功能的具体发挥与制度监管效能密切关联。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看,激励资本有效性是主要的。初期往往倾向于奉行“小政府主义”,提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充分保障资本自由竞争、激发资本活力,后来资本危机不断累积导致“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主张政府要通过扩张性政策帮扶资本、拯救资本主义。对于资本局限性和资本破坏性,主要是在持续性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的压力下,政府通过完善社会政策进行修补,以资本为主导的整体框架没有改变,对资本的制度约束效能并不充分,这就造成了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叠加,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对过去长期资本监管软化的一次总爆发。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资本危机在进一步加深,资本局限性没有得到有效矫正,资本破坏性无法得到有效防治。资本功能复杂性问题凸显,要求进一步强化资本治理效能。

三、新时代对资本功能的再认识

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直接理论启发是不能简单地全面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资本的作用。一方面,不要忽视资本所内嵌的特定生产关系,尤其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下的资本行为规律当作普遍性,只强调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淡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不能夸大、放大资本的危害,甚至“谈‘资’色变”,片面认为“资本逻辑”具有必然性,陷入“因噎废食”的资本困境,造成资本闲置、浪费和流失等,损害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民财富创造。“一刀切”思维不适合新时代资本功能有效性的完整发挥。要看到新时代以来,各类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肯定非公有制资本在解决就业、促进科技创新和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更好地激励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直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首先,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3]²⁸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突出特点在于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创新驱动越来越迫切。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逐渐让位于要素集约型增长模式,对现代经济体系、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等需求进一步提高。资本要发挥重大作用,就需要与有效创新进行积极融合。权衡^[24]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来看,资本的理论 and 实践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形态、功能和内在属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对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新经济业态等都是创新发展的热点,这就催生了相关形态的资本在产业经营结构、方式和动能方面的转型。相应地,国家要做好资本体系、科技创新体制、人才汇聚机制、营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配套工作。

其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新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3]²²共享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是对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鲜明特点的生动体现,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确地说,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是共享现代化成果,要让人民切实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缓解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解决限制现代化成果普及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等。中西部地区群众达到东部地区群众生活水平、农村人过上城里人的日子、农民收入赶上工人收入,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普遍心愿,共同富裕要逐渐实现这些具体的目标,而脱贫攻坚战取得的显著成果则提供了生动实践。针对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特点,理性的政策倾向是节制资本。张磊等^[25]提出,节制资本思想渊源深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导向,新时代节制资本包括防止资本过度集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双重内涵,要通过节制资本、缩小收入差距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促进生产增长和成果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尤其要强化节制资本税收框架和平台经济反垄断等相关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

再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成为新时代资本发展与治理的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创造,既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创新,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形态的资本,共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在功能发挥和政策监管等方面固然存在很多差异,但资本逐利的本性是相同的。张旭^[26]提出,要重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不能无限夸大,不能掩盖和忘记资本扩张活动在历史上的野蛮性和掠夺性,更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原则。由于认识不足和监管缺位,部分领域,尤其是互联网科技及其与传统产业再融合所变革催生的新行业出现了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甚至与基层小商贩们争夺“最后一分钱”的极端现象。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相应地收紧资本监管政策、整顿行业秩序,国家进一步健全立法、严格执法,果断出手强力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27]

最后,“两个健康”“三个没有变”是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政策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为各类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进入新时代以来,经过不断丰富完善,进一步把“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守正创新过程中，党中央又提出了“两个健康”“三个没有变”，进一步稳定人们对资本的信心。“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特别要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这就对新时代的企业家们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三个没有变”进一步强化了新时代中央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有序成长的政治承诺。

四、新时代资本治理的新议题：平台经济监管

平台经济监管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资本治理领域涌现的新议题，突出反映了新时代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特点。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激励科技创新，借助互联网科技平台，形成了全新的平台经济范式。历次科技革命都证明，一旦新技术、新要素出现，资本就会迅速捕捉、融合，开创新产品、新业态、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胡家勇^[28]认为，资本追逐数据技术并与之融合，形成了囊括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数据资本，赋予了金融资本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借助网络效应和智能化，对资源控制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并向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公共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领域渗透，形成了“超级资本”，以进一步谋求控制整个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权力”。这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国际社会如此、国内亦是如此。这就对资本治理新框架提出了新任务和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将平台经济监管作为资本治理的新议题纳入整体性监管框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经济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循环的本质，但资本流动加速、高周转特点突出，资本积累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资本追求短期逐利的盲目性凸显，客观上造成了监管方面的实际困难。要从技术变革、资本控制和政府监管的多元视角理解将平台经济监管列入资本治理新议题的必要性。

首先，技术变革的视角。平台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变革催生的一场技术和社会革命，利用集中化的数字工具平台进行资源交换，颠覆传统经济形态的地方在于不局限于自身资源的商品化，更可以利用平台租用他人闲置资源，重塑了竞争关系，实现了全新的“共享”“共赢”。作为私人治理结构，互联网技术平台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算法等提供了面向所有消费者的完整“数字化解决方案”，对公共交通、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创造了全新的业态，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蒙塔尔班等^[29]指出，平台经济的兴起是互联网技术变革的结果，数据的数字化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应用程序新功能的开发创造了条件，用户、专业人员和消费者通过应用程序进行匹配，无偿或有偿地共享资源，重塑了货币金融体系、雇佣—劳动关系的持续灵活化和个性化。

其次，资本控制的视角。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资本，尤其是资本的“加速”特性，离开资本的支持，平台企业无法顺利通过“创新的死亡之谷”。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相关支撑运营费用的投入如同“烧钱”，一般的小企业或创业者都不具备相应的财力。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危机感持续驱动着平台经济的不断扩张，以期待借助巨量平台规模和范围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而这毫无疑问会助长平台企业的盲目扩张。对于已投入的资本而言，迅速变现的迫切需要进一步要求平台企业加速扩张，一旦顺利变现实现高额回报，新的资本又会迅速投入到类似的平台企业，这就刺激了资本的野蛮生长。对此，冒佩华和郎旭华^[30]剖析了资本的二重性，即增殖属性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剥削属性。资本的运动规律以逐利性为核心，具体

包括三个阶段,即实体经济中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资本间竞争强化资本扩张和资本投机异化资本增殖的目的。这很好地揭示了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投机并存且相互转化的普遍情况。资本的“加速”特性,既推动了平台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相应的无序和混乱。

最后,政府监管的视角。市场经济中政府监管的重要目的在于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并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但平台经济的无序扩张在不断破坏政府有效作用的发挥。王欠欠和冀承^[31]剖析了平台经济垄断下资本无序扩张的危害,具体表现为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科学技术创新、扩大贫富差距和影响国家安全。有鉴于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立法,强化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导加大对平台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做好资本市场等配套政策组合。诸如阿里巴巴、美团、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被开出天价罚单,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滴滴出行业务被要求进行强力整顿等。更进一步地,政府妥善设计、引导资本流向的“红绿灯”规则。董志勇和毕悦^[32]提出,在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领域设置“绿灯”,引导资本可作为、应作为、善作为,不断拓展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上限”;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要明确有条件进入或禁止进入的规则,适时设置“红灯”,持续夯实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底线。

完善平台经济监管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是当代资本发展的最新形态,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和ChatGPT等应用加速和数字货币的广泛推广,数字经济将迎来“井喷式发展”。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应用的基础,如果不能及时规范平台经济,将给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隐患。这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某种苗头。迪安和靳星伟^[33]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垄断性集中、不平等加剧和政府市场的屈从,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诞生。具体而言,积累通过租金、债务和权力来实现,征用、支配和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化了,价值增值将日益依赖监控、强迫和暴力,民众的不安全感将进一步被放大。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逻辑在数字经济时代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更加隐蔽了,我们要看到平台经济“去劳动化”背后,人工智能、大数据形成的算法统治强化了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尤其是无酬数字劳动时间的延长和数字劳动强度的增加。因此,要警惕数字拜物教,防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物的统治发展到数字的统治,并进一步退化为“数据关系”,导致“个人受抽象物统治”的现象更加严重。

五、新发展格局中的资本:统筹发展与安全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党中央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指导思想,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要防止中国式现代化走偏变样,“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理论上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安全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稳固。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防止“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是进一步提升国家经济治理效能,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是割裂的,其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从资本有效性的角度看,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资本,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历史经验。从资本局限性的角度看,资本并不是万能的,经济关系难以彻底从社会关系中完全脱嵌而成为独立的单一性法则,市场也存在失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难以根治。从资本破坏性的角度看,对社会

主义国家安全和制度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也恰恰是资本，这是由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决定的，尤其要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展开了透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在对资本有效性进行肯定的同时，对资本局限性和资本破坏性也进行了否定。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既要鼓励资本有效性的充分发挥，又要及时矫正资本局限性，并充分防治资本破坏性。

发展离不开资本，安全要防范资本，这构成了安全发展的完整内涵。要正视资本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尤其是在政策不明晰、监管滞后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特殊时期。刘伟^[34]针对资本无序扩张提出资本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经济泡沫积累，滋生“庞氏骗局”，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过度杠杆化和债务化，导致“大而不倒”，裹挟政府持续为其输血；资本进入特殊敏感行业，对舆论进行不当操控，制造虚假民意，降低了社会公信力；资本规避监管，侵蚀非经济领域，部分民生领域在资本不当或过度逐利下偏离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降低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些均加剧了国家经济金融风险，危害国家安全事业。此外，涉及自然灾害、重大传染疾病、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战争等突发性灾难，资本可能趁机加以工具化利用，囤积居奇、炒作恐慌、操纵市场等。

在过去一段时期，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损害了统筹发展与安全大局，敲响了警钟。究其内在逻辑而言，最重要的是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不充分，尤其是对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解不深刻，片面突出了资本有效性，对资本局限性和资本破坏性预料不足，没有做好必要的政策监管和风险防范处置工作，放任“资本大鳄”操纵市场和部分“热钱、快钱”的投机炒作，致使重大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累积，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出现调整、尤其是利率持续下行，这些潜在积压的风险点纷纷“暴雷”。从事后处置经验看，如果能够及时干预，提前筑牢风险防控机制、扎牢政策监管篱笆，资本良性竞争、有序生长的健康发展态势完全是有可能的。这就揭示出，要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夯实安全发展的制度基础，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处置举措要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对资本功能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将中后段的监管政策前置。通过把好入口端、强化过程端、健全出口端，完善全过程资本监管体系，提升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资本治理效能。

驾驭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回顾百年图景，经过不断摸索，中国共产党成功驯化并驾驭了资本，确保资本处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控制之下，并有效实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关键在于将“人民至上”而非“资本至上”作为驾驭私人资本的根本价值选择，确保私人资本经营活动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而非被私有资本所控制。第二，平衡好市场竞争与社会保护的关系。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市场竞争和社会保护具有各自功能，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演化逻辑如果出现极端化，就会严重破坏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吴忠民^[35]认为，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若按照其各自的“本性”而自然演化，就必然会分别催生出“资本至上陷阱”“福利过度陷阱”。要防止市场竞争和社会保护突破各自的底线，确保二者协调推进。第三，坚持规律与规制相统一。要充分释放资本活力，尊重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客观规律，但要完善相关规制，确保资本的客观经营合法合规，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鼓励各种形式资本发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作用，深化营商环境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增强资本健康发展的安全感、满足感，提高企业家扩大投资的信心。

新发展格局下强化资本监管，我们要善于把驾驭资本的制度效能转变为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资本治理的现代化能力和精细化水平，建立健全适应资本功能复杂性的新型资本治理体系。特别是由传统资本治理体系所强调的“把资本管住”转变为“把资本管好”，这是新型资本治理体

系的应有之义。传统资本治理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基础之上,习惯于把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制度优势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强制性、统合性等特点。新发展格局下,为了适应新的监管范式转变的需要,新型资本治理体系应该聚焦资本这一关键要素,尊重资本功能复杂性的客观特性,监管政策设计要着重考虑实际经济代价,增强资本收益、减少资本损失,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增进资本获得感,真正意义上实现安全发展。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抓手,要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规范和引导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

六、总结与讨论

资本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话题。如何深刻理解资本功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西方“资本至上”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这就对资本功能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认知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既包含对资本肯定性理解,也包含着对资本否定性理解。由此,本文提出了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观点,即资本兼具有效性、局限性和破坏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企业家或资本家作用的发挥是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现实衍射。资本功能复杂性是对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补充和更新,为更好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资本功能复杂性的视角出发,本文详细考察了新时代资本治理的全景框架。在新时代对资本功能再认识部分,强调了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和政策保障;在新时代资本治理的新议题部分,从技术变革、资本控制和政府监管的视角剖析平台经济监管,这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资本部分,突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指导原则,分析了资本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的作用,领悟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驾驭资本的成功经验。提升国家资本治理效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进一步深化对资本理论的探讨,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探索具有双重使命。第一,在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之外,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中国发展模式必将对世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丰富国际社会探索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为人类文明新的可能发展形态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资本功能复杂性丰富了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的理论认知,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引。资本功能复杂性是资本治理的基础,国家要强化资本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是,要充分激励资本有效性,矫正资本局限性,防治资本破坏性,完善同资本功能复杂性相适应的新型资本治理体系,强化全过程资本监管能力。

新型资本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在于畅通资本作用的发挥。资本并不是问题的症结,资本运营体制不畅才是顽疾所在,恐惧资本、谈“资”色变是不正常的。资本功能复杂性是客观存在的,要通过体制创新为资本赋能,更好地推动资本作用良性健康发挥。资本功能复杂性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有效节制资本的重要性,发挥好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制度性功能,从而在激励资本有效性、最大程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矫正资本局限性,防治资本破坏性。为了适应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与政策实践要求,新型资本治理体系更应突出对资本规律的深刻把握,探索新的资本治理思路,这有助于增强资本监管能力和推进监管体系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赫尔南多·德·索托. 资本的秘密[M]. 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75.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71-205.
- [3] 张亚泽,张固宁. 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J]. 社会主义研究,2022(6):1-9.
- [4] 周建波,陈洲扬. 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2022(6):44-53.
- [5] 胡博成,朱忆天. “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逻辑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22(3):1-8.
- [6]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5.
- [7]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 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8]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财税原理[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9]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M]. 金镛,金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10] W.W.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6-60.
- [11] 洪银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属性、行为和规范——《资本论》的启示[J]. 学术月刊,2022(5):39-45.
- [12] 顾海良. 马克思“资本章”对资本理论的开创性探索——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问题[J]. 学术界,2022(10):5-14.
- [13] 赵峰,田佳禾.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资本二重性及其矛盾的视角[J]. 改革,2022(8):25-37.
- [14] 薛加奇,钱智勇. 资本发展悖论的三重维度透析——基于《资本论》文本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22(4):49-55+114.
- [15] 张一兵. 马克思: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研究[J]. 东岳论丛,2022(7):86-94+192.
- [16] 郭威,李泽浩. 资本无序扩张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学家,2022(10):14-23.
- [17] 乔晓楠. 从生息资本到货币政策:一个马克思主义异质性主体模型[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5):133-165.
- [18] 马拥军. 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与活力[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7):36-53+103.
- [19] 许欣驰,薛忠义. 马克思透视资本的三重论域:财富、权力、环境[J]. 学术探索,2022(10):60-65.
- [20]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郭武军,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34-75.
- [21] 索尔斯坦·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凌复华,彭婧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21-27.
- [2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4.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4] 权衡. 资本的逻辑批判及其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3-24.
- [25] 张磊,徐世盛,刘长庚. 节制资本与共同富裕:逻辑、难点及路径[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4):78-92.
- [26] 张旭. 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与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J]. 当代经济研究,2022(5):5-15.
- [27]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2022(10).
- [28] 胡家勇.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J]. 经济学动态,2022(10):19-30.
- [29] 马修·蒙塔尔班,文森特·弗里甘特,伯纳德·朱利安,等. 作为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平台经济:调节学派的视角[J]. 国外理论动态,2022(4):128-138.
- [30] 冒佩华,郎旭华.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2(9):14-20.
- [31] 王欠欠,冀承. 资本的双重性与平台经济反垄断[J]. 学习与探索,2022(8):139-146.
- [32] 董志勇,毕悦.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理论基础、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J]. 经济学动态,2022(3):12-20.
- [33] 约迪·迪安,靳呈伟.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J]. 国外理论动态,2022(4):117-127.
- [34] 刘伟. 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健康发展[J]. 经济学动态,2022(8):3-12.
- [35] 吴忠民.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超越“资本至上陷阱”和“福利过度陷阱”[J]. 探索与争鸣,2022(3):29-45+177.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in the New Era

YAO Jin-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

Summary: In the new era, a prominent chang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s high quality lies i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capital.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laws of capital and preven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has becom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api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deepen research of capital theory. However, most of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a certain aspect of capital function and lack a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How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of capital determines the modernization mode of a count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an urgent request for the new capital the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method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functions of capital. Based on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capit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 of the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that is, capital has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ness, limitation and destructiveness,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capital in the new era. As for the policy practic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 the play of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 or capitalist (the personification of capital) is the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the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n detail. In the part of re-understanding capital function, it emphasizes new requirements, new goals, new tasks and the guarantee of capit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the part of new issues of capital governance, platform economy regulation is analyzed from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capital and policy,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art on the capital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highlight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alyzes the role of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understand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in controlling capital in leading economic work.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contribution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i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which deepens research of capital theory in the new era. Seco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evolution logic of the country's capit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closely combines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policy practic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ully encourage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correct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 prevent capital destructiveness, improve the new capit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whole-process capital supervision.

Key words: capital; capital function complexity; capital function in the new era; platform economy regulation;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责任编辑: 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07.003

[引用格式]姚金伟.新时代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探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3(7):31-41.